

编号: NO.6

钓鱼台档案

中国与欧、拉美、非洲国家之间重大国事揭秘



上

NO.6

釣魚臺

中国与欧、拉美、非洲
国家之间重大国事揭秘

档案



红旗出版社



ISBN 7-5051-0269-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钓鱼台档案/《钓鱼台档案》编写组编. —北京:红旗出版社, 1998. 8

ISBN 7-5051-0269-9

I. 钓… II. 钓… III. 外交-概况-中国-现代 IV. D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2806 号

钓鱼台档案(NO.1 - NO.6)

——NO.6 中国与欧、拉美、非洲国家重大国事揭秘(上、下册)^{49.80}

编著者 本书编写组

封面设计 杨群 李栋

责任编辑 毛传兵

版式设计 曾繁正 刘进

红旗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邮政编码:100727

(北京沙滩北街2号)

河南省沁阳市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 48插页

1998年9月北京第1版

170印张 3000千字

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 - 10000 套

定价:298.80元/套(全套共六卷)

每卷 49.80(上、下册)

ISBN7-5051-0269-9/Z·82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毛泽东和拉美、非洲朋友在一起。





1973年9月12日，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。



周恩来和埃及总理加麦·阿卜杜勒·纳赛尔在一起。

1957年1月，周恩来访问波兰时，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·哥穆尔卡、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在一起。





1954年4月，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。会议排除美国的干扰，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。

1955年4月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。会议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



1960年9月12日，毛泽东和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·杜尔在宴会上。



1956年1月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，并观看铁托总统赠送的礼品。



1956年9月，毛泽东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。

前 言

玉渊潭钓鱼台，在阜成门外西南一带，从八、九百年前的金代开始，这里就逐渐被开拓为众多的园林别墅。

在古代，以钓鱼台称名的风景胜地颇多，其中著名的有陕西宝鸡的姜太公钓鱼台；有浙江省的“严子陵钓鱼台”。严子陵青年时代，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好友。刘秀称帝后，严子陵不愿意依仗老同学的关系，称臣求荣，于是就隐居富春江畔。后人敬佩他，把他住过的地方叫做“严子陵钓鱼台”，或“严陵滩”。也因此钓鱼台便成了隐闲逸处的代名词。如山东濮县的庄子钓台，江苏淮安县韩信钓鱼台，福建闽侯县东越王余善钓台，湖北武昌县孙权钓台，大冶县唐代张志和钓台等，也许只不过是后人附会其事，赐以佳名，并非本人真在其地钓过鱼。

玉渊潭钓鱼台本是金代旧运粮河边的一座花园。中都城在广安门外西南一带，城外有护城河。玉泉水由西北而来，流经玉渊潭，汇注于护城河。这条河道在辽代称为“萧太后运粮河”。河道湾湾构成水乡一片，不少官僚富户抢地建园，皇帝也在这里盖起御园行宫。钓鱼台仅是这许多大小花园中的一座。

过去北京西郊有四处钓鱼台，即南钓鱼台、东钓鱼台、西钓鱼台、玉渊潭钓鱼台。

南钓鱼台，在白云观以西的会城门村。那里曾有金朝外城北城墙会城门的护城河。

东钓鱼台，在药王庙村以东，三里河村以南，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以前，是北京西郊一处很有名气的地方。从玉渊潭流出的河水斜向东南，到圆通观村前分成两股，一股向南，一股向东流

入护城河。这里水溪环绕，把个三里河村变成了水乡。乾隆常常陪着他母亲到玉渊潭钓鱼台观看杂耍表演。他母亲很喜欢热闹，嫌阜成门外的东钓鱼台附近过于冷清，于是乾隆就在三里河路北圆觉寺一带办起庙会，每年五月初一到十五举办一次。圆觉观内供奉的是关公，据说关公当年单刀赴会是在五月十三日，因而庙会的正期也就订在这一天。乾隆把这个庙会叫“单刀会”，当地居民呼为“老爷磨刀”，简称“磨刀”。从三里河村的东钓鱼台到玉渊潭钓鱼台，一路上热热闹闹，茶馆、饭铺、杂耍场、戏棚栉比林立。每逢庙会正期，城内外的秧歌会、中幡会、五虎棒等文武香会，相继来到这里演技酬神。从乾隆到同治年间，庙会常常连续举行半个月，到光绪年间，又增加到两个月，把“单刀会”改称“三里河避暑”。这原先带有宗教色彩的庙会，渐渐变为夏日避暑纳凉的地方，三里河东钓鱼台也因此闻名京城。1900年，这里惨遭八国联军的洗劫，桥塌水涸，一片凄凉。

西钓鱼台，在玉渊潭钓鱼台以西，马神庙之西南。昔日这一带原是成片的农田，中间一条旱河穿过，东岸土山连亘，茂林绵绵，西钓鱼台就在距离旱河很近的地方。辽金时代，这里河水湾湾，一片水乡景色，其间有封建士大夫追求隐逸雅趣的“养尊林泉”、“钓鱼河曲”等风景名胜。西钓鱼台，便是其中一所大宅园的遗迹。清朝，有个名叫“供王四”的人，在前门鲜鱼口内摆摊卖“供尖”（即散碎的蜜供），日有盈余，积攒甚多，于是在钓鱼台附近的罗道庄，买了二三亩薄地，盖一所土房。没想到挖掘地基时，竟掘得大批窖金，一跃而成了大暴发户。他觉得这里是“福”地，把整个罗道庄都给买下了，大兴土木，在山湖池沼中建起住宅多达数百间，成了这西钓鱼台附近的头号大富翁，后来竟与清王室攀成联姻，家中郎婿多为贵族子弟。1911年以后，“供王四”家势日渐衰落，他的后代乃将一部分田园和住宅卖给当时的北平农学院。

玉渊潭钓鱼台，风景秀丽，过去这里是权贵显官的花园和别墅。以后逐渐败落，变成了茅舍村落，所以村名叫花园村。金代著名的

文学家王郁，幼小就居住在花园村，成年后，又在这里隐居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才华。他常常约集二、三知己在附近河边垂钓，并且自筑高台专备钓鱼之用。《明一统志》和《帝京景物略》都曾专门记述了此事。《归潜志》也说：“王郁飞伯，少居钓台，潜心述作，未尝轻求人知。李钦叔过钓台，得其所著赋及碑，大惊，归荐于诸公。自此去钓台，游四方，后为兵所杀。”王郁走后，金代帝王把这里圈占为禁地，并改建同乐园行宫。遍种珍草、奇花、异树于园中，假山、亭榭、露台散置其间。这座钓鱼台一半伸入池中，汉白玉制水榭是金朝帝王和后妃垂钓赏荷的地方。园内西北隅，有一座庄严典雅的“瑶光殿”，是帝王的行宫。每到盛夏，皇帝在这里“消夏”，名为“消暑”，也在这里开宴赏月。有一次，适逢赏月之时，突然，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，海陵王完颜亮很不高兴，即席吟词：“停杯不举，停歌不发，等候银蟾出海。不知何处片云来，做许大遇天障碍，虬髯燃断，星眸睁裂。惟恨剑锋不快，一挥斩断紫云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。”可见这一带是金代帝王们常常游幸之地。

到了元代，这里园林被毁。“同乐园”的一部分为丁姓所有，经过修膳，改称丁氏园。后来，丁氏因园中池水名玉渊潭，于是就用“玉渊”二字命名园中诸亭。

以后，玉渊潭钓鱼台为马文友所属，马氏在这里建起了“饮山亭”和“婆娑亭”等建筑。

明朝万历年间，玉渊潭钓鱼台又成了慈圣太后的父亲武清侯李伟的别墅。根据《帝京景物略》的记载，此时的玉渊潭钓鱼台已经坍塌，既无台，又无亭，早已失去同乐园时代的繁华。

明朝末年，战事频繁，京师野战不断发生，玉渊潭钓鱼台被夷为废墟。至清乾隆时，西郊玉泉山、香山一带的泉流因无泄处，每逢夏伏季节，大雨成灾，危及京师。乾隆三十八年，决定挖掘玉渊潭，使之成为接收西郊诸水的大水库。

改造香山引河，是清代西郊治水的工程之一。这条引河，俗称“旱河”，有河床、河堤。无雨季节，河床干涸，可以行车走马，有

的农民还在河床上开辟麦田。一到雨季，山洪暴发，决堤淹村，沿河附近一片汪洋。

旱河的上游，从玉泉山静宜园前的买卖街起，下经东宫村、南辛村、楼后村、到鲍家窑，再向东南流经小屯村西村口外，折而向南，经篱笆居村、梆子井村，南平坡庄到双槐树村，折向东南到半壁店五孔桥，从朱各庄折向正东，经罗道庄至西钓鱼台，再向东流入玉渊潭钓鱼台。其下游则从玉渊潭的南宫门前斜向东南至圆通观前分两股：一股向南，经五统碑村、白云观后身、甘雨桥，流入西便门外的护城河；另一股，从圆通观前折向正东，经药王庙村、三里河村，穿过三里河桥折至东钓鱼台，往东流入护城河。

经过整治，玉渊潭得到扩展，原先只有天然泉水自涌自溢的浅水池变成了一座水面广阔的大湖泊。在大湖四周堆山石，栽花木，建亭阁殿堂，立宫门，筑围墙，垒起了城门式的钓鱼台，玉渊潭钓鱼台又一度繁华起来。乾隆赐以别名“养源斋”，但北京居民都直呼“钓鱼台”。其实钓鱼台只不过是养源斋园内一部分建筑（城门式钓台）的名称。为什么改名“养源斋”呢？这里有两个意思：一是在五间正厅的前面，有水自泉流出，故名“养源”；第二，在封建帝王看来，所谓听政就是理民，理民是政事之源。“养源斋”正厅是皇帝听政的地方，所以取名“养源”。

“养源斋”的西边有品字形的潇碧轩，窗格玲珑，玻璃四照。再往西过桥有“澄漪亭”，建于石山之上，亭中有乾隆御笔园景诗句：“墙外为湖墙内池，一般凭栏有澄漪；惕赐意在修渠政，何心瓶罍细较斯。”

“养源斋”是清代风景胜地之一，不少民俗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，如放河灯、登高、封台等等。

在封建时代，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，人们要在水中放灯赶鬼净邪。“养源斋”一带湖水宽阔，正是放河灯的好地方，每当七月十五，王公大臣们都来到这里观看河灯，因而钓鱼台又有“望海楼”、“望河楼”之名。

农历九月初九日为重阳节，是北京例行的登高日。每逢这一天，“养源斋”一带十分热闹。在钓鱼台城门西面和南面以及附近会城门村箭沟一带，都有跑马、赛车之会。清代，以骑射著称的八旗兵丁驻扎京城，骑射技术逐渐普及于民间。每遇庙会和令节，各族民众，尤其是满、蒙两族的居民，争先在庙会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，举行赛车、赛马。登高节这天，还有一些皇戚子弟和富家子弟带上炊具、车马、幕帐、乐器，约集票友、歌妓，跑到城外郊野的高台土坡上，架起幕帐，摆上桌椅，大吃所谓“爆、烤、涮”，又吃又唱，纵情歌舞，有的还在山下跑车跑马。

“重九封台”，指的是一年一度从四月初一开始的“文武香会”，到“重九”这一天就停止活动了。在上古，人们认为五谷生长，要靠神的“默祐”，风调雨顺或旱涝风灾，全由“神灵”操纵，只有恭敬求神，讨得神灵的欢喜，才会有好收成。于是人们就想出了“谢天酬神”的办法，跳起“双狮舞”、“秧歌舞”，举行耍弄五虎棍的文武香会。这种活动，渐渐变成了民间流行的一种人人喜爱的传统文娛会演。后来，封建帝王也常把各地文武香会的节目，召进皇宫和御苑中表演，取名叫“皇会”，还颁赏龙旗仪仗，称演员为“供奉”。

参加文武香会的人，自认是艺人，其演唱也是戏曲，把“梨园”说成是自己的本宗，它们的行头、场面和角色与戏剧界的行当基本相同。上台前所祭祖师，也是“轩辕”、“神农”、“喜神”。这“喜神”就是唐明皇李隆基。

梨园原是唐玄宗教练歌舞艺人的地方。在当时皇宫蓬莱宫之侧的宜春院，玄宗亲选舞技高超的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名在梨园学演歌舞，有时亲加教正，称为“皇帝梨园”。后来，人们把戏班也叫梨园。由于文武香会自称梨园，所以也有开台和封台的习俗。梨园的开台日是正月初一，封台日是腊月（12月）20日。文武香会的创始因与农事有关，开台日是农历的四月初一，一年耕耘开始，遍地禾苗将油然而生，即以“五谷生长茂盛而酬神”；封台日是农

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，节气已到秋末，五谷丰登，一年农事业已完竣，“酬神”之礼即可告终。从开台到封台期间内，无论何时何处，只要有约，随请随到，决无推诿。但是，一俟封台之后，即使是皇帝老爷叫他们演唱，也是宁死不应。这是一种社会上的约定俗成，所以封台后，皇帝老爷也不会再找他们演唱了。“养源斋”既是皇帝的行宫御苑，这一年一度的文武香会“封台会”，也必须在这里举行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溥仪把“养源斋”作为私产赐给了他的太傅（业师）陈宝琛。陈氏喜之不尽，设宴狂饮。之后，立诗社，招游客，日无虚席。当时的北平大学农学院，早有改玉渊潭钓鱼台为校舍的打算，对陈氏的举动极为不满，发表声明，组织请愿，迫使陈氏“自动”交出。“七七”事变之后，北平沦陷，陈宝琛当了汉奸，“养源斋”再一次为其占有。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，玉渊潭钓鱼台才逐渐开辟为公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旧园面貌一新，于1959年成为国宾馆所在地，包括古台在内，占地面积达49万平方米左右，15座造型古朴、雍容华贵的宾馆楼，形成新型园林组群，馆内河道环流，弯曲有致，树木葱茏，新辟三个人工湖，引玉渊潭水注入。

古钓鱼台的皇帝行宫于1982年进行了重修，基本上保留了清代乾隆行宫的原貌。行宫内斋、轩、亭、台的建筑形式，各具特色，充分体现了我国古典造园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。养源斋园曲廊迂回，散置峰石，秀润多姿。淙淙溪流，在斋前汇成一池碧水，游览者至此，心与景会，鱼鸟亲人。潇碧轩三楹，门前临池即可垂钓。澄漪亭建在土阜石山最高处，登台俯览，玉渊潭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。

自然，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，钓鱼台国宾馆颇带几分神秘。它是各国首脑、政党领袖、社会名流及王室成员访华时的下榻之处，安全保卫森严，外人很难窥见其踪影。君不见，多少世界级的

风云人物曾出入其间，在钓鱼台留下了匆匆的足迹。当这些荣享中国国家贵宾身份的白人、黑人、黄种人徜徉在这座幽静豪华的皇家园林时，谁能想象得到，某些震惊世界的国事风云正酝酿其间，而后将载入史册，影响后世。

《钓鱼台档案》是一个关于中国与各国国事交往的活的纪录，记载了一系列影响地区双边、多边关系及全球战略格局的中外交往事件；展示了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如何面对欧美大国的封锁，积极开展独立外交，为维护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，为维护世界和平，增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，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出的不懈努力。

为了充分揭示中国与各国重大国事的历史真相，《钓鱼台档案》按国别和洲际关系分类，以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关系为主体，分设六个卷号：NO. 1 中美，NO. 2 中苏（俄），NO. 3 中日，NO. 4 中英，NO. 5 中国与亚洲各国，NO. 6 中国与欧洲、拉丁美洲、非洲各国。显然，这个“档案”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全球外交活动，首次对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进行了多侧面、多角度的描述，其中不乏有动人心魄且鲜为人知的内幕曝光。

从钓鱼台看国事风云，《钓鱼台档案》提供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聚焦。昔日的京郊玉渊潭钓鱼台如今已为繁忙的三环线所包围，但对于京城百姓来说，钓鱼台国宾馆仍是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，它的幽深，它的静谧仍会牵动无数过往行人探寻的目光，牵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风云……



1988年1月，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。



1964年9月30日，毛泽东和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·凯塔交谈。



1992年10月13日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邓小平交谈。

1973年1月13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中将，并观看他赠送的精美画册。



1987年10月13日，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卡达尔。



1988年9月5日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访问我国。





1987年4月13日，邓小平会见葡萄牙总理卡瓦科·席尔瓦，中葡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。

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会见葡萄牙总理安东尼·古特雷斯。



1985年，邓小平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。